

女性的自审——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心理分析

彭彩云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张爱玲的小说侧重于对人物的心理分析, 尤其是潜意识心理分析。当然, 她的小说不限于对女性心理的分析, 但作为女性作家, 她有意无意地偏重于对女性的关注。她对女性自身痼疾的揭示, 对女性潜意识心理的分析, 为后来女性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路子。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文学; 心理痼疾; 潜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1-0086-04

在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在五四“人的觉醒”“人性的解放”浪潮的感召下, “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和先进的男性知识者一起, 对男性中心话语表达了强烈的反抗, 从冰心、庐隐到丁玲、萧红, 共同表达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展示了伤痕累累的女性心理世界, 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

在这个基本的女性叙述中, 他们把女性的深重灾难完全归之于社会, 归之于男性中心社会, 少有人对女性自身在漫长的男权社会逐渐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所审视。而张爱玲对女性的心理痼疾和潜意识心理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在她的笔下出现了女性的自我观照、自我审判、自我解构的新气象。和她同时代的女性比较, 甚至和她以后相当时期的中国女作家相比较, 她高于其他女作家的地方就在于她不仅写出了女性成为“第二性”的种种外部原因, 更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写出了女性自身的主观原因和内在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 张爱玲的女性主义色彩体现得最为鲜明, 也最为突出。

在张爱玲的笔下, 女性是生活的行动者、感受者, 是自我欲望的释放者。这些女性在压抑和内囿双重力量制约下而出现的那种迂回复杂的心理现实, 也正是城市新旧交替时人欲际遇的一种呈现。女性构型由形象的外部走向了内部, 作家努力复现女性的内心状况, 包括性匮乏、心理分裂、压抑、内囿、焦虑诸经验。在这里, 女性不再作为一种色情符号, 而是作为一种生存主体而存在。张爱玲的女性气质使她更多地关注女性, 关注女性的家庭生活, 关注男女情爱。她笔下

的都市也成为了静态的都市, 有一种冷寂的荒凉。她的小说摒弃了新感觉派冗长的呓语般的内心独白和大段的心理描写, 她总是利用暗示, 将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 显得更加本土化、民族化, 将传统和现代极佳地结合起来。她重视非理性的盲目力量在人性结构、人际关系及人物命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对人的潜意识、变态心理和各种情结进行逼真的刻画和深入的挖掘, 使得隐蔽在社会或人生的外部现实之下的内部现实和内心真实得以浮出水面。张爱玲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创作, 使她的作品成为了女性心理刻画的极佳范本。

一、对女性自身心理痼疾的揭示

张爱玲小说对女性自身心理痼疾的提示, 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 是提示了女性人性本质上的自私和冷酷。传统母亲的形象是温柔、善良、富有爱心和牺牲精神的, 但在张爱玲的笔下, 母亲的形象则完全不同了。在张爱玲审视的目光下, 母亲这一形象已褪去了伟大神圣的光环, “母亲”们不仅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 也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 还是自身人性丑恶的直接表现者。张爱玲对文学传统中大量充塞的颂扬伟大母爱的作品抱有反感的态度, 称其为“滥调文章”。母亲也罢, 其他人也罢, 作为一个“人”, 就逃不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和冷酷, 这就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她把亲子关系还原为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而对母性作出了极个性化的审视。

这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形象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密秋儿太太。

说作为母亲的曹七巧有仇视子女的心理，似乎难以理解，人们常常只知道母性中“爱”的一面，而忽视了与它对立的另一面。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过：“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均不适用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和对处境的反映。”^[1]心理学也认为，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和孩子的父亲与自己的感情有密切关系，感情不和所生的孩子，易被母亲仇视，虽因责任感和伦理道德努力压抑这种倾向，但潜意识中仍隐含了伤害孩子的意念，从而形成一种冷酷的仇视心理。据此我们便很容易理解曹七巧对长安、长白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虐待。她整夜不睡地盘问儿子的私生活，并且在亲家母在场的麻将桌上将儿子与儿媳的隐私公之于众，并百般羞辱儿媳，使亲家母都不忍听下去而离开。她看到女儿与童世舫和谐交往，长安以惊人的毅力戒掉鸦片，与童世舫谈婚论嫁，被金钱和性欲扭曲了灵魂的七巧像一个疯子一样，她对女婿童世舫散布阴森的谎言，说女儿是一个断不了瘾的烟鬼，从而断送了女儿的婚事。

密秋儿太太的经历和曹七巧的经历大致相同，她也是一个经历了艰难生活的寡妇，她把她的恨转嫁给女儿，她一手葬送了一个个女儿的幸福。她自己没有获得完美的婚姻，便让女儿和她一起过修道院般的生活，连报纸都要审查过才让女儿们看。她那些纯洁无知像玩具娃娃的女儿们最终无法进行正常婚姻生活，回到了她的身边。在她满面笑容和满面泪痕的背后隐藏的是自私的本质和无限的杀机。

自私是人的本性，人性的真相。当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感情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真相时，人们接受其他关系中的种种难堪也是必然的了。当然，可以从更具有理想精神的立场来批评张爱玲的消极态度，批评她对人性所持宽容态度中的小市民气，然而，你又不得不承认她对血缘亲情的理解，对人性解剖的独到与深刻。

其次，是提示了女性对男性物质和精神上的依附心理。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对女性精神奴役的创伤揭示最深、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在她的笔下，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的自觉，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婚姻是他们寻找依靠的惟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自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可能挣脱了没落的封

建礼教的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这种对男性的依附心理首先体现在物质和金钱上的一种依附。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也就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她们把依附男人当做天然思想和行为。久而久之丧失了独立人格而不自知，物质和生存之上的精神，如人格、爱情等都成为可以忽略的需求，因而即使婚姻中没有爱，她们也不敢有丝毫的不满，白流苏、敦凤、微龙等人皆如此。张爱玲借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婚姻选择，感情上的矛盾，半推半就的无可奈何，细腻地剖析了女性这一精神上的痼疾。如《留情》中的敦凤“出卖极有根底，上海数一数二的大商家”，但命运不济，十六岁出嫁，二十三岁死了丈夫，守了多年的寡，生活落魄之后只好再嫁，“初嫁从亲，再嫁从身”，敦凤有了自己选择的可能。可是她选择了给五十多岁的米先生做姨太太，用敦凤自己的话说，“完全是为了生活”，在这一桩婚姻的交易中，米先生获得了晚年的一点清福艳福，弥补以往婚姻的不顺心，敦凤获得了生活的保障。

第三，是揭示了女性强烈的虚荣心理和物欲贪求。虚荣心和贪图物欲并非女性专有的心理痼疾，张爱玲也是把它当做人性中的弱点来揭示的。但是当它和依赖性结合在一起时，就显得更为沉重，在一部分女性的身上显得更为鲜明。葛微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在对葛微龙的描写中，张爱玲揭示了这位青年女性虚荣与贪图物欲的心理痼疾。葛微龙出生于落魄的封建世家，她出场时还不失为一个单纯而有个性的女学生，她也曾想通过自己求学的努力立足于现实，她比川嫦、玉清等“女结婚员”更有独立精神，对她所出身的家庭更有叛逆性，她甚至希望寻找浪漫的爱。但没落世家经济的穷困，迫使她走进了先于她叛逆的姑妈的府第。她姑妈的山庄里汇集了东西方社会最丑恶的生活方式，种种丑恶的行为都以都市化、西方化、现代化的面目出现，到处充满了物质的诱惑和精神的堕落。小说细腻地描写了葛微龙初入梁太太魔窟时紧张惶恐的心情，当她拉开壁橱，发现里面挂满了衣服，金翠辉煌。她偷偷地一件一件地穿在身上试，明白了梁太太的用心，但终究无法抵御这物欲的诱惑。

然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场，微龙之后的堕落，每一步都与虚荣心与贪图物欲密切相关，她曾想过逃离梁太太的魔掌，却迈不动逃出去的脚步，终于一步一步地从一个想有所上进的女学生成为堕落的交际花。尽管明知她的未来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

她也“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张爱玲对女性心理痼疾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与鲁迅所揭示的国民性有相通之处，但是，鲁迅和张爱玲的目标有所不同。鲁迅的目标在于“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张爱玲并无再造民族灵魂的愿望，她揭示并接受了人性丑恶的客观事实，仅此而已。尤其在她的前期作品中，基本特征就在于揭示人性的阴暗面，少有亮色，对女性心理痼疾的揭示同样建立在这一基点之上。女性若没有对这些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来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展示的女性心理痼疾，对女性意识的重建和发展是一种贡献。

二、对女性潜意识心理的剖析

张爱玲对女性潜意识心理的剖析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 变态心理的刻画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性本能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又不能得到恰当的宣泄，即没有受压抑冲动的升华，便会形成一种病态心理，导致性变态或其他心理障碍。《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最典型的人物，她的变态心理在潜意识中是一种性变态。七巧的哥嫂为了金钱将七巧嫁给姜家残废的二儿子，七巧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被一堆“腻滞的死的肉体”所代替。姜家三儿子季泽的出现燃起了七巧的欲望，但季泽的理性提醒她“不惹家里人”，七巧正常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只能压抑自己，开始以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压抑的结果是使她产生变态心理。当曹七巧的身份由一个少妇转变成一个母亲时，她的变态心理发展成为一种仇视嫉妒心理和旺盛的占有欲，更多的人成为她变态心理的受害者。张爱玲由此刻画了小说史上最刻毒、阴鸷的母亲形象，她把所有的恨、所有的不满转向了无辜的一双儿女，她成了一个彻底的心理变态者。弗洛伊德在分析这种变态的情形时说：“他们当中有许多种变态的人们，他们的性生活与一般人所感兴趣的相距很远。这些人的种类既多，情形又很怪诞。这种性变态者，都是不近人情的虐待者，专门想给对方以痛苦和惩罚，轻一点的，只是想对手屈服，重一点的，直至要使对方身体受重伤。”^{[2](54)}“实际，性倒错者的患者很像是一个可怜虫，他不得不付出痛苦的代价，

以获得不易求得的满足。”^{[2](57)}曹七巧不断地用金钱，用对儿子的乱伦意念，对女儿的仇视嫉妒换取欲望的满足，最后只落得死之虚空。

曹七巧在张爱玲的小说群中并不孤单，因为还有人跟她遥相呼应着，那便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和《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英国人密秋儿太太，这两人同样是具有变态心理的典型。梁太太嫁给年迈的富商，得了财产却失去了青春，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她以丫鬟和侄女为诱饵，笼络各种年龄的男性，从而葬送了自己亲侄女的终身幸福，她的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与统治欲是导致这一切的刽子手。密秋儿太太则是巧妙地运用寡妇的护犊心理来掩盖自己的变态心理和对子女的占有欲。她自己婚姻残缺，便要女儿也过修道院般的生活，这从她之前以类似的方式葬送大女儿的婚姻便可看出端倪。她要占有女儿，不惜葬送女儿的婚姻，葬送罗杰的生命，获得自己欲望的极不容易的满足。

(二) 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凸现

张爱玲的小说中，《心经》可以说是最富于心理分析意味的，它再一次在文学中展示了“厄勒克特拉情结”这一古老的命题。情结是由于一种心理动作本可以成为意识的，但被压抑为潜意识，而落入潜意识系统，同类被压抑的成分构成的集合体便是情结。弗洛伊德把俄狄普斯情结解释为儿子恋母嫉父，是以子辈为主体，在情欲上企图恢复与母亲原初统一的无意识状态。相对于“俄狄普斯情结”中男子的“爱母妒父”，女子对于父亲的爱恋和对母亲的妒忌则被称为“厄勒克特拉情结”。

《心经》是对恋父情结的形象阐释。《心经》写了一个女孩爱上自己的父亲许峰仪并因此对自己的母亲充满敌意的故事。许小寒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自觉不自觉地对母亲充满了一种排斥。母亲偶而穿上了一件美丽点的衣裳或者是对父亲稍微表现出一点感情，她就笑母亲，用这种方式来打击父母之间的感情，离间他们之间的爱，视母亲为情敌，认为自己和母亲“只是爱着同一个男人的两个女人。”许小寒的介入使父亲既不爱她的母亲，也不爱她，而是与同小寒长得相似的段绫卿同居，寻求替代和补偿。父女俩都躲不开乱伦的罪恶感和恐惧感，在理性与非理性中痛苦挣扎，最后导致这种爱的必然的悲剧性。

(三) 阉割焦虑的叙写

阉割焦虑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幼儿性欲在受到父亲强大力量的宰割，又遭到父亲亲自施以体罚或阉割时，会导致幼儿产生一种“阉割焦虑”，不得不屈从“现实原则”，压抑欲望，认同其父。就张爱玲本人

来说，她的阉割焦虑是与恋父情结纠缠在一起的。她对她的父亲既感到惧怕厌恶，又不时怀念父亲的温情，在一种很矛盾的情绪里挣扎。她经常将这种焦虑移植到作品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味到她对父亲的恐惧，而她对父权至高无上的瓦解及有意识矮化男性都可看做是她对这种焦虑的宣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花雕》中的川嫦，《多少恨》中的漾珠等都在阴影的笼罩下焦灼不安，这种潜意识的焦灼正来自“父权”的压力。旧式家庭中的“父”，为维护父权制度的稳定，必须对“子”进行阉割，但作为一种威胁和一种可能实施的惩罚，“阉割恐惧”却深深植入了子辈的生命意识中。“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成为张爱玲小说中子辈的共同命运。

（四）潜意识的剖析

弗洛伊德首次将人的意识结构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潜意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明显表现出来的意识只是心理结构的冰山一角，更庞大的潜意识和无意识躲藏在其中，从不经意的动作失误、口误、笔误以及梦等非常状态下流露出来，并且常因伦理道德的抵触以其他方式改头换面地出现。这种崭新的见解对于探寻文艺创作尤其是性爱题材创作中的无意识动机和动力，文本结构的多义性、多层次性，文本与作家心理、历时经验的联系，深化对作家、文本、读者以及创作过程的认识，意义独到，不可替代。“艺术家的任务不仅要表现人的意识活动，而且要深入到人的无意识中去，探索心灵的奥秘，以揭示人的丰富多

变的内心世界，达到心理上的真实而非表面的真实。”^[1]作家通常通过无意识的动作失误、口误、笔误、睡梦及自由联想，把内心的冲突塑造成外部的形象，达到揭示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的目的。张爱玲十分重视潜意识在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她也很善于通过种种感觉和细节描写，折射出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心理——性心理，使文章显得张力十足。《倾城之恋》中范柳原第一次吻了流苏之后，“然而他们两个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想象中已经发生了无数次了。”而流苏在抵抗感情的同时，也感到在“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表现了隐藏在人物潜意识深处的原欲（力比多）的蠢动，写出了性爱动机的神秘性和非理性。张爱玲用对潜意识的挖掘，揭示了女性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为现代女性文学开拓了新的领域，推动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女人[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291.
-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性欲三论[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1.
- [3] 王宁. 文学与精神分析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3.

Women's self-examination: On women'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in Zhang Eileen's novels

PENG Caiyun

(School of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Being affected by Freud'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Eileen Chang's novels focus on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figures, especially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ubconsciousness. Of course, her novels are not limited to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women. She revealed the women's own psychological illness and analyzed the women's subconscious psychology, which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terature.

Keywords: Eileen Chang; women's literature; mental illness; subconsciousness

[编辑：苏慧]